

中国天主教 历史译文集

|| [美] 鄢华阳等 著 ||

|| 顾卫民 译 ||





〔美〕鄢华阳等 著

顾卫民 译

中国天主教 历史译文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经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宇宙光出版社)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0-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天主教历史译文集/[美]鄢华阳等著;顾卫民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633-9864-5

I. ①中… II. ①鄢…②顾… III. ①罗马公教-基督教史-中国-文集 IV. ①B97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3152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组 稿:郑纳新
责任编辑:魏 东
封面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5

字数:120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自序

林治平教授率领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工作团队在纪念马礼逊牧师入华宣教二百周年之际,出版有关中国基督教历史文化论文集七十册。邀请台湾、香港和大陆研究中国教会史的专家学者作为撰稿人,这是数十年来中国教会历史研究的盛事。当我接奉作为撰稿人的邀请函时,内心深为感动。因为我深知“宇宙光”作为传播福音的机构,在其本身出版经费并非十分充裕的情况之下,仍致力于学术事业的鼓励与倡导,这与林老师本人宏大的志向和高远的见识是分不开的。基督宗教自其初创以来,其传播从来是与学术的奠基以及宏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很久以前,我也听林老师谈及他本人受业于方豪司铎的故事以及从事历史研究的爱好和甘苦,我想,他内心深处的这种心结,也应该是促成这一志业的动力。

虽然在最近的二十年中,我从未离开过中国教会历史研究的专业的耕耘,但我毕竟是一名年轻的学人。我当然很珍惜这次出版的机会,但仔细地查看自己的论文,深觉将它们汇集成册还是为时尚早;因为其中不成熟的、尚需修改的内容还很多。考虑再三,我觉得还是将最近一段时间中翻译的十一篇有关中国天主教史的论文汇集

出版更为妥当。译文集汇集成册出版的机会不是很多,虽然我不是这些论文的作者,但是将它们译介成中文,其间也曾倾注了我的心血。同时,广大的中国读者,也可以借此机会了解到欧美学者如鄢华阳(Robert Entenmann)和乔凡诺(Agostino Giovagnoli)等教授在历史研究中关心的问题,以及他们严谨平实的表述方法。我力求在自己的译作当中去体现这种平实的风格。当然,读者能否感觉得到只能由他们自己体会和评述。

在我看来,中国教会历史的研究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作为中国的学人,仍然应该以谦逊和学习的态度,去了解原始的史料中蕴涵的意义,以及外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及其关心的问题。“了解”并不等于完全的“赞同”,但不愿意去“了解”和解读,那么就是迹近“无知”了。在这里,“译介”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当我从电话中将自己的想法告知林老师的时候,得到了他的肯定和赞同,这既使我感动,更使我高兴。这是一个敦厚的长者对于晚辈的深深的理解和爱护。

顾卫民

2006年5月5日于上海寓所

目录

CONTENTS

清代早期四川中国天主教会的建立 / 1

- 一、社会的环境 / 3
- 二、四川天主教会的重建 / 4
- 三、18 世纪早期的传教事业 / 4
- 四、早期的基督教社团 / 8
- 五、宽容的终结 / 9

18 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 12

- 一、四川天主教的起源 / 13
- 二、中国籍神父 / 15
- 三、中国传道士和善会会长 / 20
- 四、四川天主教会的本地化 / 24

18 世纪四川的中国基督徒贞女 / 25

- 一、基督徒贞女的起源 / 27
- 二、基督徒贞女制度的建立 / 29
- 三、梅神父重新组织社团 / 31
- 四、教会和贞女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 34

五、1784 年以后的贞女制度 / 35

六、结语 / 38

1810—1820 年四川的迫教者、殉道者和背教者 / 39

一、18 世纪晚期四川的天主教徒 / 41

二、嘉庆皇帝时期四川的迫害 / 44

三、结语 / 52

18 世纪四川教会的“礼仪之争”问题 / 53

一、中国礼仪与早期四川传教事业 / 55

二、李安德在四川的牧灵工作 / 57

三、结语 / 62

从李多林(又名徐德新)主教自 1789 年至 1805 年的通信看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四川本地社会中的天主教 / 64

一、历史背景:巴黎外方传教会与中国 / 64

二、1789—1805 年四川的天主教 / 66

三、分散在四百个传教站点中的四万名天主教徒 / 67

四、基督徒生活方式和当地的传统 / 69

五、1803 年在崇庆州附近召开的四川会议 / 73

博克塞:澳门与耶稣会士 / 77

传教士与文化的全球化:印度的经验 / 87

一、文化全球化:葡萄牙传教士与圣多默基督徒 / 87

二、圣多默基督徒的文化、社会地位和组织结构 / 89

三、葡萄牙人来到以后的叙利亚教会:适应性地相互作用 / 90

四、在戴拜(Diamper)主教会议前的事件 / 92

五、1599 年戴拜教务会议:将拉丁教会的统制强加于东方教会 / 95

- 六、教务会议以后的马拉巴教会：回应，破裂和反叛 / 98
- 七、历史的教训：对本地文化的基督教的挑战 / 100

诺比利：印度的利玛窦、宗教对话的先驱者 / 102

- 一、诺比利的最初实验 / 103
- 二、辩论与皈依 / 106
- 三、反对和争议 / 108
- 四、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敌意 / 110
- 五、诺比利为自己辩护 / 113
- 六、诺比利的晚年 / 116
- 七、作为作家的诺比利 / 119

教宗利奥十三世时期中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 / 122

本笃十五世任教宗时期罗马教廷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134

- 一、背景 / 134
- 二、中国采取的主动 / 136
- 三、非基督教地区要否派驻教廷使节 / 139
- 四、法国的反应 / 141
- 五、教廷和基督教国家的权利 / 143
- 六、面向新的前景 / 147

清代早期四川中国天主教会的建立*

(美) 鄢华阳

大多数研究早期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伟大的先驱传教士们,以及他们与中国朝廷和文士官吏的关系上面。这极大地说明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以及有助于理解基督教在跨越文化的环境中的作用。然而,对于基督教在中国内地普通人民中的流传,却研究甚少。

有两种特殊的原因,使得四川省成为此类研究中特别令人感兴趣的题目:(一)作为传教士在内地,即远离与西方发生最密切关系的沿海地区活动的个案研究;(二)作为一个在传道方面产生丰硕成果的,尤其在这个边陲省份有着在中国正统思想之外丰富的民间宗教土壤地区的个案研究。确实,在19世纪晚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说:“早期传教士的热忱给四川留下了比任何其他省份更多的天主教信徒团体。”

* 本文作者为 Robert Entenmann 教授,中文名为鄢华阳,执教于美国圣奥拉夫大学历史系(History Department of Saint Olaf College),原文发表于 *Echanges Culturels et Religieux Entre La Chine et l'Occident*, published by 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1995。

天主教是在明朝的最后数年中传入四川的,当1724年雍正皇帝宣布禁教时,天主教在四川已经有了80年的传播史。利类思(Ludovico Buglio),这个出身于西西里的耶稣会士,于1640年来到四川。他带了北京官吏刘宇亮的介绍信,刘氏出生于四川省绵竹地区。

他最初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功。1641年,他为30名信徒付洗,其中有两位是居住在成都的宗室成员。1642年,另一位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加入了利类思的工作,他应利类思之邀从杭州来到四川。利类思和安文思在省会成都建立了传教据点,也在重庆和保宁建起了教堂。他们的传教工作也抵达了邻近这些城市的地区。

他们的信徒似乎包括一些官员和文士。比如,在新奉地区,有一个原先信奉道教的退休军官颜督,转而皈依天主教,并且带领其家人和仆役一同进教。他告诉他们:只有天堂的永恒福乐才能满足人们的渴求,只有信奉天主的人才能获致永恒的生命。他建造了一个教堂,称它为圣母堂。在新奉有另外一些人也跟随着颜氏皈依了新的信仰。

有些人被天主教所吸引,但不愿意进教,因为天主教禁止纳妾。有些人拒绝受洗并由此产生对天主教的敌意。和尚和道士也发现这个新的宗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竞争者。

1644年,利类思与安文思被张献忠抓获。张在短时间内对其款待甚厚。两年以后,清廷打败并杀了张献忠,俘虏了两名传教士,并解送北京。

在17世纪40年代战火中幸存的天主教徒很少,根据18世纪晚期传教士冯若望(Jean Didier de Saint Martin)的说法,有些教友逃往山区,最后买到了土地并且定居下来。有时,他们为居留地起了具有宗教意义的名字,诸如圣母坝、若瑟湾。但是,幸存教友的数目的确很少。19世纪以前大量的天主教人口的形成是在清代,尤其是在18世纪。

一、社会的环境

四川天主教社团的形成是由该省地处边陲的环境决定的,尽管四川作为中国本部的一部分已有两千多年之久。叛乱和战争伴随着明朝的沦亡和接踵而来的清朝的征服将四川夷为废墟;张献忠的割据,清朝的入关和明朝的抵抗,三藩之乱,饥馑和瘟疫更是伴随着这些军事战役。该省的人口从大约 400 万降至 100 万或 200 万。

然而,在随之而来的清廷征服的一个世纪中,四川的人口却有了戏剧性的增加。在四川本省,包括少数民族部落地区,人口从 1680 年的大约 200 万增至 80 年以后的约 1500 万。这一人口统计的增长首先是由于从华南和华中来的移民,特别是从湖北、广东、福建和江西诸省的移民。在 18 世纪上半叶,四川是个边远的省份,吸引着来自不同地区的寻求土地和生计的定居者混合居住,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该地区继续接受移民,以填补其人口上的损失。

这些定居者抛却故土、家族和庙宇祠堂,甚至是其亲密的家庭,移居四川省。定居者和当地人都要依靠为他们提供相互支持、保护和友情的组织,以使其生活更加安全可靠。宗教的归属感,尤其是宗教性的组织团体,经常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种有关结成团体的、相依为命的、相互支持的和精神团结的意识。它提供了一种结社团体,他们对世界的解释也要比正统的儒家思想更加合理。有组织的民间宗教赋予其支持者一种属于团体的集体意识、血亲关系和村社联系,他们也许许诺现世的幸福与来世的得救,尽管非法的白莲教教门是 18 世纪四川最重要的民间宗教,而罗马天主教会也具有这样的功能。

二、四川天主教会的重建

由于清军要分别与明军、四川地方武装和独立的叛军和土匪作战，清朝花了 20 年的努力才巩固了其在四川的统治。省会成都，这座鬼城^①，直到 1659 年，也就是最初被张献忠占据 15 年以后，才最后被清军占领。1660 年，四川的大部分地区才得以平靖，尽管在以后 5 年中川东仍有军事行动。一些天主教徒似乎回到了成都，1663 年有人说那里有 300 名教友。然而，在以后的 10 年中，他们又似乎杳无音讯了。

1660 年，皈依天主教的重庆道台许纘曾，曾经试图寻找天主教教友和移民，他听说其中有些人在保宁。他邀请一名法国耶稣会士穆格我，从陕西的传教点来重庆照管他们。穆格我首先在保宁和重庆展开工作，据说他在一年中即付洗 600 人。在回到陕西的汉中以前，穆格我在四川只待了两年。他在汉中曾拥有 4000 多名教友。

在穆格我离开以后，由于传教士的缺乏以及四川的不利条件，使得传教事业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无法开展。1674 年，吴三桂揭开了三藩之乱的序幕，四川又被叛军占领，直到 1680 年才被清军克复。在这以前，四川已经经受了将近 40 年的持续不断的战乱。

三、18 世纪早期的传教事业

1702 年，四川重新有了传教士的活动，当时有四名欧洲的传教士来到这里。其中有两位遣使会士，毕天祥 (Luigi Antonio Appiani) 和穆天尺 (Johannes Mullener)，在重庆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发现有十名基督徒都是湖广人，他们居住在一幢属于该城的一名显要的教友的日子里。

① “鬼城”似指丰都，疑为作者之误。

另外两名巴黎外方传道会的传教士,白日升(Jean Basset)和梁宏仁(Jean-Francois de la Baluere),在一名叫张凤的传道员的陪同之下,在成都居留下来。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五名天主教徒,都是最近从外省来的移民。其中一名来自湖广,三名来自陕西,一名来自南京。

在这两座城市里,传教士们几乎立即遭遇到了困难。有谣言说他们与白莲教和瑶族的叛乱有关系。1702年12月,白日升和梁宏仁在成都找到了一所有六间室的房子,可作为住所和教堂,他们树立了一块牌子,上面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写了“天主教”字样。然而,一位住在附近的官员对他们说,他不允许在他的辖区里出现这样的事情。他还威胁说要殴打白日升并将他枷号示众。他还试图找到以前的房主,企图中止租约,不过没有成功。

白日升发现有必要作一次艰难的旅行,前往西安,请求川陕巡抚觉罗华显的帮助。尽管旅行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白日升在传道员张凤的陪同之下,只用了15天时间,克服了旅途严冬的艰辛,抵达西安。“我从未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恶劣和危险的道路,”白日升写道。白日升带了价值30或40两银子的礼物,他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川陕巡抚命令四川省的官员宽容传教士的活动。尽管白日升发现川陕总督满人贝和诺最初并不友好,但是当他收下了一个欧洲制作的怀表以后,终于对传教士产生了好感。

在重庆的传教士们遇到了同样的排拒。负责重庆城防的军官拒绝让毕天祥和穆天尺传道,很明显,他相信有关传教士是叛乱分子成员的谣言。更有甚者,一场火灾将传教士们的邻舍烧成灰烬,但传教士的居所却丝毫未损,许多人来到这里寻求避难。那个军官指责是传教士们有意纵火。最后,白日升从成都赶来,访问了重庆的行政长官,并呈献礼物赢得了他的好感。但是,地方官吏们依然将基督教视为异端邪门,并经常骚扰传教士及其中国教友。有一次,巴县地区的地方长官发布了一份布告,声称“天主教是异端邪说,我们不应当相信它们”。

鉴于四川天主教徒本身的利益,要求培植本地的教会领袖,欧洲传教士们很早就开始培养中国籍的神父和传道员。1703年,当白日升从

西安回来时,他到达陕西南部的城市汉中。在那里,他从 20 名献身于为教会服务的传道人中新吸收了三人,这三名男孩的年龄介于 7 岁至 12 岁之间,白日升训练他们服务于教会。其中一个年龄最大的在抵达四川后不久死去。另外两名,李安德和党怀仁,后来祝圣为四川教会的神父。

李安德和党怀仁都在梁宏仁的指导下学习。他们的课程是严格制定的,包括拉丁文和“四书”。白日升还试图教一些年轻的学生,但很难取得成功。早在 1703 年,白日升和梁宏仁就建议应该在中国建立一座修院。6 年以后,梁宏仁的学生李安德建立了中国第一所修院。

在重庆的遣使会传教士训练中国籍神父的努力也取得了成果。穆天尺于 1715 年成为四川宗座代牧,他授予几个学生以小品(minor orders)。在 1720 年至 1725 年之间,他祝圣其中三位成为神父,他们是苏宏孝、朱彼得和斯得凡徐,他们三位以后都赴欧洲学习。

早期的欧洲传教士也认识到训练本地传道员的重要性。这些教友领袖是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之间重要的媒介。当教友的组织团体发展而又缺少神父的时候,传道员就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们也处理许多教会的世俗事务。作为中国人,他们能够买卖土地和房屋,不致引起当局的怀疑。他们购进土地,然后租出以支持教会的活动,他们也将得到的房子用于教会人员居住和礼拜的教堂。这些传道员也经常为传教士作向导和当翻译。

在 18 世纪早期教会的许多成功范例中,著名传道员张凤的工作尤为突出。他出生在广东,于 1702 年陪同白日升和梁宏仁来到四川。据说他在说服背教的教友改过回头的工作上卓有成效。1744 年成为四川宗座代牧的马青山(Joachim Enjobert de Martiliat)写信形容张凤:“从不停止徒步走访每处,本省任何地方的人,甚至是外教人,只要提到张凤的名字,无不肃然起敬。”

1704 年 11 月初,白日升和梁宏仁任命了三名会长和一名助理。其中一人常在教会,已经是传道者。另一人是成都居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是个手艺人,专门制作圣像。第三个教会领导人管理着成都周围乡

村的教会组织,是一个四处走动的木匠。

欧洲的传教士们,尽管以成都和重庆为据点,仍然经常到乡村中旅行和传教。比如,1705年1月,白日升和另三名传道士,花了五天时间,到一个距成都25里格(League,里格,一里格约等于三英里)的不知名的乡村里作旅行。在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教友,他已经有20年没有看见神父了。白日升留下一名传道士为他的妻子和儿子讲解教理,他们二位都不是教友。等到白日升回来时,他为其妻子付洗并接受其子为望教者。

当他们到达目的地以后,白日升为邀请他去的那位教友的妻子和母亲付洗,他也接纳了他们的一些亲戚为望教者。

他们中有两位寡妇决定决不再嫁了,尽管亲戚们对其施加压力,要其再嫁。其中一名年轻的27岁的妇人,走了两天的路去看白日升。白日升为她两岁的儿子付洗,并接纳了她的母亲、兄弟、妹妹和8岁的女儿为望教者。这个年轻寡妇的姐姐及其整个家庭也入了教。

传教士们的努力不久即结出了果实。白日升报告了1704年的统计:

接受望教者	47名	付洗者	17名
办告解	51名	领圣体者	39名

从1705年初到1705年7月13日,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统计如下:

接受望教者	62名	付洗者	28名
办告解	47名	领圣体者	45名
施终傅礼	1名		

两位在重庆的传教士也取得了相同规模的成功,他们似乎还建立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传教据点。1703年,毕天祥和穆天尺报告,重庆约有100名信徒。

四、早期的基督教社团

大多数的中国天主教教徒都居住在城镇和乡村。在法国传教士的笔下,称他们的聚会点为“会口”。在 20 世纪初期,法国传教士 F. M. J. 古洛东曾对许多聚会点的早期历史作出过研究。他的研究使得描绘 18 世纪最初几十年四川天主教社团的发展成为可能。

早期的几个会口分布于成都平原及附近地区。在 1700 年以前,两个黄姓但无亲戚关系的家族,一个来自湖广,另一个来自贵州,两家都定居在安岳地区相距 5 公里的地方。这些家族繁衍起来,到 20 世纪时他们的后代已经有 1200 人之众。另一个姓谢的家族也于 1713 年安居于安岳。在成都西边的邛州,白日升还皈依了一个姓童的家族。

在成都南边的嘉定县,白日升皈依了一个姓唐的家族,并且建立了一个叫落壤沟的会口,后来成为 18 世纪四川最重要的基督徒聚会点之一。

在重庆出现的最重要的天主教家族姓罗。不平凡的是,它是本省奉教家族中少数几个四川本地的家族之一。罗家在重庆拥有钱庄和其他的商业。很明显,它是四川最殷实的奉教家族。毕天祥和穆天尺在重庆逗留期间就居住在罗家。在康熙时代(1662—1722),重庆有一姓张的家族,在从湖广迁徙至四川以前已经皈依基督教。张家的一个儿子与罗家的一个女儿结婚,他跟从姻亲学习丝织技术,据说变得富裕起来了。

在四川天主教徒最集中地区中有一个在江津地区的胜冲坪。江津最显要的天主教家族姓骆,它在胜冲坪建立了一个会口。骆家很可能是客家人,他们原籍在广东,可能在 1690 年前后在江西南康地区定居。1695 年,该家族皈依天主教。后来不久,也许在 1700 年或 1701 年,骆良位和骆良义兄弟带领他们的家族移民来到四川。良义在到达四川省后不久死去。他的兄弟,按照佛教的而不是天主教的风俗,火葬了遗体

并用一个坛子装了骨灰埋葬起来。

根据骆家的家谱,与骆家一同来到四川的还有几个信奉天主教的家族,分别姓巫、王、马、邱和宋。他们最初定居在落壤沟,约在 1723 年迁居江津。骆良位在赵家庄买了土地,他建起了一片称为胜冲坪的房舍,这里位于长江北岸,距离一个名叫油溪的集镇约 15 公里。他还在龙门滩附近买了地,这是一个长江南岸上的集镇,离油溪的下游不远。

当他们还住在落壤沟的时候,有一天骆良位在一个集镇上遇到了白日升。他与白日升交谈,并给白背诵了经文以表明他是教友。很明显,白日升还不知在落壤沟还有教友的集居,他很高兴地发现这一地区还有基督徒。他接受了骆的邀请访问了他家。骆家所有的人都在白日升访问期间都接受了天主教信仰。

到了 19 世纪以后,骆家继续成为四川最显要的奉教家族。从 1825 年至 1856 年,四川有 54 位中国籍神父受祝圣,其中骆家有 5 人。

五、宽容的终结

在 18 世纪的最初几年中,来到四川的 4 名欧洲传教士建立了该省天主教的基础。他们管理着一小部分四川天主教本地教友,以及从外省来的奉教移民。在中国传道员的帮助下,他们开始在成都、重庆及附近地区展开皈化工作。

然而,传教士们并不安全,他们的身份也是模棱两可。尽管时时遭到迫害,在 17 世纪晚期传教士在中国仍然找到了安全的地方。1692 年,康熙皇帝颁布谕旨,明确规定传教士可以建立教堂,中国人可以在教堂中做礼拜。尽管内地对传教士的活动有限制,尤其在 1707 年以后,但在传教宽容时期天主教在中国仍然教务昌盛。到 1722 年康熙皇帝统治结束时,中国约有 30 万天主教徒。

但是,1707 年的“礼仪之争”给中国天主教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教宗克莱门十一颁布了《自登极之日起》诏书,规定天主教徒不得参加